

哲学史

78 日常语言哲学，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在过去几周里，我们一直在追溯实证主义运动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经验主义发展历程，它坚持认为所有知识主张都必须符合所谓经验科学的标准。实际上，逻辑实证主义正是这种理念的巅峰。我们已经探讨了导致逻辑实证主义衰落的一些因素，其中之一便是日常语言哲学（与理想语言哲学截然不同）的兴起。

也就是说，对罗素以及至少部分实证主义者而言，理想状态是用一种摆脱了所有模糊含义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知识，因为这些符号是根据明确的经验点来定义的，并且用形式逻辑推理来展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符号逻辑的使用是一种形式逻辑意义上的理想语言。正如我所说，这催生了逻辑实证主义运动和日常语言运动。后者，即我们今天将要讨论的维特根斯坦等人，对前者提出了反对，他们坚持认为理想语言过于还原论。

你记得奎因反对还原论吗？它过于还原论了。事实上，语言在日常使用中承担着许多不同的任务，而不仅仅是分析和描述经验数据。

因此，其吸引力在于语言用法的多样性。当然，这个概念一开始可能不太容易理解，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先举个具体的例子，即关于宗教语言的争论。我们可以从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中尚未完成的部分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你可能还记得，上次我们在讨论第六章“伦理与神学”时，成功地谈到了他对伦理学的处理，但没有谈到他对神学的处理。他给出的解释非常直白，你可以概括如下：就意义的可验证性标准，即事实意义而言，“上帝存在”这一命题在事实上并不具有意义，因为它无法直接或原则上通过经验来验证。

上帝并非感官对象。事实上，“上帝”一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本身毫无意义，因为它不指向任何经验对象。因此，任何关于上帝的讨论都没有任何事实意义。

所以，所有神学语言，所有关于上帝的语言，所有神学语言都缺乏事实意义。其结果并非他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其结果在于，有神论、无神论和不可知论都同样毫无意义。它们什么也没断言。

也就是说，任何具有事实意义的事物。其结果是，宗教与科学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逻辑冲突，因为科学断言事物，而宗教不断言。那么，又怎会有冲突呢？最终的结果是，宗教体验无法提供任何证据，因为宗教体验谈论的是心理状态，是用语言来描述宗教体验，谈论的是心理状态，而这些心理状态是可以用来经验描述的，但谈论体验本身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上帝的经验性参照。

他谈到，神秘主义者以传统的方式谈论上帝时，总是将上帝描述为深不可测、无法言喻的。我们只能通过否定的方式来谈论上帝。因此，不存在任何具有事实意义的神学语言。

艾耶尔的论述正是如此，约翰·威斯顿在1944年一篇题为《诸神》的文章中也重申了这一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在英国期刊《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上。威斯顿在文中指出，讨论上帝或诸神这类概念，更多的是在探讨人们的情感，而非事实。更多的是情感而非事实。

缺乏实证依据。约翰·威斯顿的文章引发了一场颇为著名的讨论。我记得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BBC，之后被反复印刷转载。

你可以在各种宗教哲学文集中找到它们。但这次大学讨论所涉及的，或者说讨论的内容，是神学与证伪的主题。神学与证伪。

很明显，这里体现的是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参与讨论的有三人，其中一位是安东尼·弗卢，我已经把他们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了，方便你们记住。

其中一位是安东尼·弗卢，为了帮助怀疑论者理解信徒谈论上帝的方式，他讲了一个关于隐形园丁的寓言。隐形园丁。也就是说，一些探险家偶然发现一片被围墙、栅栏或其他类似东西包围的土地，然后……显然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它经过精心耕耘，除草完毕，总之，它被精心照料过。

所以他们想看看是谁干的。但他们找不到任何人。他们四处徘徊，却始终没有人出现。

于是他们开始自言自语，说起了一个看不见的园丁。这就是他们想出的解释。那么，从可验证性和可证伪性的角度来看，你会怎么说呢？你怎么能用经验数据证伪一个看不见的园丁的存在呢？根本不可能。

嗯，这就是信徒们谈论上帝的眷顾和慈爱的方式。这样一来，所有与神的眷顾、恩典和作为相关的内容都可以用这种故事形式来概括。虽然这无法通过经验验证，但令人惊讶的是，那些探索者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讨论。

第二位参与者是RM Hare。RM Hare。他更接近于智慧所强调的将宗教讨论仅仅视为情感表达的观点。

或许是某种存在主义的感受，但无论如何，那都是一种感受。在他讲述的故事里，一位牛津大学的学者，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有着某种特殊的眨眼。而这种眨眼，是一种非理性的执念。

他对此深信不疑。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一种感觉，觉得有人要杀他。这种感觉支配着他的所有行为。

他时刻都在观察着。这解释了他的行为方式。你看，这位隐形园丁其实是对某些事情的一种解释。

但现在黑尔谈论的是如何解释个人的行为。那些隐形的园丁就像是超然的观察者。但这位牛津大学的学者呢？深度参与其中。

他很在意。这件事对他来说意义重大。这更多的是一个宗教问题。

当然，他所说的并非一个可以通过经验验证或证伪的断言。因此，它回避了……因此，它必然会受到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批评。然而，它就在这里。

但这并没有让他打消念头。你看，这位教授眨了眨眼。嗯，第三个人是巴兹尔·米切尔，他本人曾是牛津大学的神学家。

巴兹尔·米切尔讲述了另一个寓言，另一个关于陌生人的故事。陌生人的故事。请记住，这个故事创作于四十年代末。

他指的是被占领的法国。你只需要告诉别人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从哪里获得路线信息。不，还有他们能获得路线信息这一事实。

解释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一个陌生人来了。这个陌生人告诉他们要反抗邪恶的占领者。

他们会为他们提供所需的资源，并且他会再次降临，取得彻底的胜利。因为他们相信了这位陌生人，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行为。显然，这位神学家所指的是已经降临的基督，以及所应许的第二次降临，那将带来彻底的胜利。

但陌生人的言语、承诺、行为和个性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们完全信服。因此，尽管目前他们对陌生人的描述无法通过实证检验或证伪，但无疑可以解释他们的行为。所以，这三个案例都讲述了一个故事，用来解释宗教人士的信仰和行为。

这是一个无法通过经验验证的故事。不过，你可能会注意到，关于陌生人的故事原则上是可以在未来进行验证的。约翰·希克后来称之为末世论验证。

原则上是这样验证的。好的。但关键在于，在这三份报告中，所谓事实性语言的使用都非常随意。

在这三个例子中，都提到了园丁、陌生人或潜在的杀人犯。明白了吗？在每个例子中，都存在一个无法通过逻辑实证主义检验的事实陈述。而这场讨论也被广泛认为是引发持续辩论的导火索。

这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日常语言的看法，即实证主义的标准过于简化、过于狭隘。语言的用途远比实证主义者所能解释的要广泛得多，即使是事实性语言也不例外。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也就是整个五十年代，一些其他的观点开始提出新的问题。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宗教哲学界也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

其他一些观点也相当有趣。剑桥大学有一位名叫布雷斯韦特的教授，他认为宗教语言实际上只是关于非道德的承诺。我记得有一次听他演讲，他说当他去教堂背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时，他实际上只是在委身于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他并非信奉传统生活方式所依据的那些命题的真伪，而仅仅是委身于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不妨说，他采用了康德式的宗教观，认为宗教是道德义务的象征性表达。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没错，就是我们现在在德性伦理学等领域耳熟能详的那位麦金泰尔，他现在在圣母大学任教。当时的麦金泰尔是一位年轻的苏格兰-爱尔兰裔教授，他试图论证宗教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语言游戏。

也就是说，宗教用途与其他所有用途截然不同。它既不能用道德语言来描述，也不能用形而上学语言来描述。他称之为特有的。

因此，他所论证的不过是一种特立独行的陈词滥调。当然，如果宗教语言是特立独行的，缺乏经验成分，那么它就无法接受任何经验证据的检验。你或许很快就会意识到，他当时持有的是一种巴特式的神学观点，在这种观点下，自然神学以及任何证明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据都是不被认可的。

因此，这种独特的陈词滥调就足够了。然而，正是在同样的背景下，另一位名叫保罗·范·布伦的人，当时（我记得）在坦普尔大学任教，出版了一本名为《福音的世俗意义》的书。

这开启了“上帝之死”神学的时代，正如它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被称为的那样。上帝之死神学。他的观点是，在一个世俗的时代，一个世俗的科学时代，我们必须赋予宗教语言新的意义。

我们必须赋予宗教语言新的意义。传统的超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上帝语言”，在世俗科学时代是一种死语言，毫无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任何具有事实意义的事物都可以通过经验验证。

所以，基于可验证性原则，他认为上帝已死。他的意思是，传统意义上的上帝语言是一种死语言，毫无意义。

因此，我们对福音的理解本质上是一种世俗人文主义。它是一种掩盖其他承诺和关切的语言。于是，人们探索了各种各样的替代方案。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逻辑实证主义似乎已经达到顶峰，开始衰落，而宗教哲学则重新焕发活力，成为一门完全合法的学科。我认识威廉·奥尔斯顿，他现在是美国宗教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50年代末，当时他是一位不可知论者，在密歇根大学教授宗教哲学。

正如我所说，他是宗教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致力于基于宗教经验论证上帝的存在。另一位最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是乔治·马夫罗狄斯，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了一本名为《信仰上帝》的小册子，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论断。因此，宗教哲学的复兴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如今，正如你们大多数人所知，它或许已经达到了自那时以来的巅峰，不仅在宗教哲学领域，而且在哲学神学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就，没有人会因为宗教哲学无法通过经验验证就断言它毫无意义。

由此，我们便得以了解语言用途的广泛性。现在，有了这番介绍，我想谈谈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因为在很多方面，正是他的思想动力和哲学研究促成了本书的诞生。本书英文版于1953年出版。

它的第一部分于1945年以德文出版。由此可见，这与我之前提到的那些变化是同时发生的。维特根斯坦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行为。

也就是说，语言并非像实证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仅仅局限于认知和情感两种功能。它更是一种社会现象，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运用。生活，尤其是人类生活，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

语言是一种工具，无论身处何种生命形式，它都发挥着作用。因此，他所说的语言游戏种类繁多，你可以玩各种各样的游戏。他举了一个类比：比如说，你可以拿到一副扑克牌，然后用这副牌玩很多种游戏。

所以，纸牌游戏种类繁多。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英语学习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玩各种各样的英语游戏，也就是语言游戏。现在，让我读几段文字，从中你可以了解他的写作风格和他想表达的意思。

他说，想想工具箱里的工具。里面有锤子、钳子、锯子、螺丝刀、尺子、胶水罐、胶水、钉子、螺丝，而词语的功能也像这些工具的功能一样多种多样。所以，你应该把语言想象成一个工具箱，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工具，可以用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一两件事。

或者，几页之后，他又问：句子有多少种类型？现在，他指的不是命题。命题只是其中一种。句子，是语言形式。

句子有多少种类型？比如说，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哦，种类繁多，用法各异。而且这种多样性并非一成不变，因为新的语言类型、新的语言游戏不断涌现，而旧的则会过时并被遗忘。

“语言游戏”一词旨在强调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活动、一种行为、一种生活方式。现在，让我们通过以下例子来了解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下达命令和服从命令。

描述物体的外观，给出其尺寸。根据描述或图纸构建物体。报告事件。

对事件进行推测。提出并检验假设。展示实验结果。

编故事。读故事。演戏。

唱歌接龙。猜谜语。讲笑话。

解决算术问题。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提问。

感谢。咒骂。问候。

祈祷。你知道，他很快补充说，这只是其中几个例子。因为这里涉及不同的行为，不同的行为涉及不同的语言使用方式，而不是还原论的观点。

他指出，他担心的是我们不会混淆语言的不同用法，从而制造出一些逻辑难题，而这些难题实际上并非真正的问题，只是语言滥用的结果。他是这么说的：哲学家的工作在于为了特定目的而收集各种提示。

如果你试图提出哲学论点，就永远不可能质疑它们，因为它们必然是关于词语的，而每个人都会同意。所以哲学本身并不发展理论。它仍然是一种疗愈性的活动。

解决问题。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如何把苍蝇从瓶子里弄出来？你有没有遇到过瓶子里有苍蝇，需要把它弄出来的情况？该怎么把苍蝇弄出来呢？真是个难题。所以，哲学的本质就是消除困惑。基于一种更为宽松、更广泛的人类行为和人类语言行为的经验方法。

他举的一个例子或许有所帮助。他有一本小册子，实际上是根据他的一些讲座整理而成，书名叫《不确定性》。显然，主题是认识论。

他所做的，正是挑战启蒙运动认识论的一项要求：对确定性的要求。如果你愿意，他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批判启蒙运动的认识论。

他首先提到了G. E. 摩尔在英国科学院发表的著名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摩尔本想证明两个物质对象同时存在。记住，这里是一个。这里是一只手。

我知道这是一手牌。那么，当我们说“我知道这是一手牌”时，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的行为和摩尔的行为都表明他们知道这是一手牌。

而这些话只是重申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怀疑这一点毫无意义。怀疑这是一手牌毫无意义。

我知道的，某种程度上是我给你的一种保证。我个人向你保证，我手里拿着的是真凭实据，而不是什么虚假的东西。但除此之外，我所说的“知道”也意味着，我对世界的认知基本正确。

我知道这只是他那套更为宏大、连贯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其中包含着他所谓的某些基本信念。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持有一种基于常识的现实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是通过相关的言语行为来论证的。这就是莱尔。

我收回刚才的话。那是维特根斯坦。现在简单说说吉尔伯特·赖尔，他一直到五六十年代还在发表作品。

他的两本书。一本叫《困境》，另一本叫《心灵的概念》。《困境》这本书，没错，它探讨的是哲学争论、哲学问题，比如现实主义与唯心主义、自由与决定论、身心、科学与宗教等等。

把它们当作备选方案提出来，似乎会让你陷入两难境地。他专门写了一本书来探讨这些两难困境。他的观点是，这些都是虚假的两难困境，是伪问题。

关于语言所涵盖的领域存在争议。这些争议代表了他所谓的——莱尔因这一概念而闻名——范畴错误。范畴错误。

当一个词被用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时，就会造成歧义，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争议。现在他举例说明了范畴的概念，他谈论的是不同的语言游戏。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使用的词语有时会导致对语言游戏的混淆。

但他会举例说明他的意思。就拿这项著名、高尚、令人愉悦的英国运动——板球来说吧。他说，嗯，有击球手，还有投球手，我姑且称他为投手吧。

这里有球门柱，就是插在地上的木棍。那是球场，就是球门柱和球场之间的21码距离。但是团队精神在哪里呢？哦，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它并非像其他事物那样的经验对象。因此，他认为哲学问题，即感官知觉问题，正是由此产生的。我们感知的是物质对象，还是仅仅感知到感官数据？这取决于你使用的是神经生理学的语言，还是日常经验的语言。

如果你谈论的是日常经验中的感知，那么语言游戏的本质就是让你看到物质对象。如果你谈论的是神经生理学中的感官知觉，那么语言游戏的本质就是让你看到感官数据。那么自由和决定论呢？嗯，如果你谈论的是因果条件，那就是决定论者所做的。

但如果你从责任的角度谈论同样的行为，那就是非决定论者的做法。你可以谈论同样的事情，却玩两种不同的游戏：决定论的游戏和非决定论的游戏。科学和宗教也是如此。

身心亦是如此。现在，有些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说，哦，好吧，那么两种语言也可以互补。于是他们援引了科学的互补性原理。

中的互补原理？我们如何描述光的传播方式？它是以波的形式传播还是以粒子的形式传播？为什么非此即彼呢？互补性暗示着波粒二象性。存在两种互补的事物，对同一现象的两种互补描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嗯，在他的心智概念中，他并没有明确指出两者是同一回事，因为他在那里讨论了身心问题。

他试图做的，是绘制——注意这里的用词——他试图绘制出逻辑关系图。这是一个非常熟悉、流行的短语。当你试图理清事物脉络时，你就是在进行逻辑分析。

如果你在研究逻辑地理，你就是在做一些地图绘制工作。所以你试图绘制出我们已有的关于心智的知识的逻辑地理图。你试图发现一些新的信息。

但要描绘出我们已有的知识的地理分布。已有的知识？是的，就体现在我们的语言行为中。因为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是在语言历史的数百年间发展、尝试、完善和检验的。

因此，各种各样的隐性知识都隐藏在这些行为之中。而他在“心智”概念中试图做的，就是描绘出这些隐性知识。现在，你会注意到“心智”和“身体”都是名词。

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地养成了将身心视为两件独立事物的习惯，将心理状态和生理状态视为两种不同的类别。这一切仅仅是因为“身心”都是名词。

人们往往被表面的语法相似性所误导，而没有深入探究词语在语言行为中的实际用法。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从心理语言和肢体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分别将其与私人行为和公共行为区分开来，将意识行为与生理行为区分开来。

所以，情绪和动机仅仅是个人以某种方式行事的倾向。这是主观行为，它引导我们做出某些客观行为。当你对洛杉矶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时，你实际上是在说，我想对某人大吼大叫。

你说私人感受是一种倾向于外在行为的倾向。嗯，他的做法是将所有关于心灵和心理活动的陈述都转化为行为陈述。于是，他提出了一种被称为语言行为主义的身心问题理论。

心灵语言仅仅是描述私人行为的语言。语言行为主义。不是形而上学的语言，不是。

但心理语言指的是实际的、预期的或可能的身体行为。就是这样。嗯，正是他的那本书，《心灵的概念》，引发了一场关于心灵哲学的辩论，这场辩论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今天。

你们当中有些人修过心灵哲学课程，所以对这方面有所了解。顺便一提，我们最近有两种心灵哲学的教学方法。一种是罗伯茨教授的课程，这种方法更侧重于心理状态方面的心灵哲学。

情绪，内在倾向。好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罗伯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分析我们说话时的意思、我们说话时的行为以及我们说话时的想法。

你看，因为他的哲学方法深受维特根斯坦这种日常语言技巧的影响。他偶尔会开设维特根斯坦课程，这是他在耶鲁大学师从保罗·霍尔曼攻读研究生时学到的。你看。

所以，他运用这种方法非常有效，而且不受某些人对形而上学的限制。另一方面，如果你研究过一些心灵哲学方面的内容，比如奥康纳在当代形而上学中所做的，你就会发现，你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但关键在于，在后实证主义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中，心灵哲学的形而上学方面和哲学心理学方面都得到了发展。

所以罗伯茨的兴趣在于哲学心理学方面，更接近吉尔伯特·赖尔和维特根斯坦的传统。而奥康纳的方法则更偏向形而上学方面，与科学哲学相关。大卫。

不，你知道，如果你试图让他明确表达对心智的看法，我认为他会倾向于副现象论。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些大脑活动背后的现实是什么？他认为，有些心理现象是大脑活动的副产品。

所以我认为莱尔是某种副现象学家。有时他也被称为行为主义者，但前提是你要先加上“语言行为主义”这个前缀。谈论心理实际上就是在谈论私人或公共行为。

他的观点是，关于心智的语言可以毫无保留地翻译成关于行为的语言。所以，问题又回到了可翻译性上来。好了，以上是莱尔的观点。

在我继续之前，你想先停下来思考一下吗？他引入了一个在机器概念中颇为著名的观点。他把笛卡尔关于心灵以某种方式存在于身体中的观点称为“机器中的幽灵”的神话。如今，“机器中的幽灵”这个说法已经广为人知了。

你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听到这句话。它几乎和“我思故我在”（*Cogito Ego Sum*）一样出名。真的。

这是那种记者们经常引用的短语，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机器里有幽灵的迷思。他在这里所做的，其实就是在论证，仅仅因为“心灵”和“身体”都是名词，并不意味着一个实体存在于另一个实体之中。

你看，这就是机器里有幽灵的传说。好吧，我这里讨论的三个人里，JL Austin无疑是最有趣的。这并非评判标准，也不是什么哲学上的精辟见解，虽然它确实有助于理解我的观点。

他确实很有幽默感。他于1955年出版的《如何以言行事》一书，试图系统化地阐述不同类型的语言用法。换句话说，他认为在维特根斯坦提出的众多语言用法中，可能存在某些主要的表达类型。

他试图将这些概念系统化，其影响颇深。他区分了认知性话语（例如断言和命题）和种类繁多的施为性话语。你还记得我说过，根据艾耶尔的观点，“的确如此”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施为性话语吗？

它并没有增加任何实质内容。与其空口断言，不如付诸行动。这是一种行为性言语。

好的，他谈到的是言语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现在，我们把这些统称为语言行为。我认为，“语言行为”这个词是由约翰·塞尔（John Searle）提出的，他任教于伯克利大学，在他的著作《言语行为》（*Speech Acts*）中提出了这个概念。

请注意，在语言行为的概念中，言语行为指的是语言的使用是一种社会行为。好的，那么，区分言语行为和言外行为。言语行为仅仅是指说出某事的行为。

非常宽泛的类别。言语行为，即话语。但言语行为是指你在说话时所采取的行动，因此称为言语行为。

言后行为，是指通过说话来采取行动。言后行为。现在，举个例子，言外行为，说话本身就是行为。

你说这话的时候就是在表演。你是在宣布判决结果。你是在回答问题。

给出建议。你说话的方式就是在给出建议。从语后行为的角度来看，语言只是一种手段。

你在劝说某人做某事。你在阻止某人做某事。你的话惹恼了某人。

重点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你试图通过说这些话达到什么目的。你本来可以换一种说法，也许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这又回到了我们使用的各种方法的问题上。

嗯，这类研究引入了语言行为的概念，使之广受欢迎。但关于J.L. 奥斯汀，你可能还会对他的著作《感觉与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a）感兴趣。请注意，他的名字是奥斯汀（Austin）。

你认识另一位奥斯汀吗？简·奥斯汀，她写过《理智与情感》。那是一部小说。这位是J.L. 奥斯汀，《理智与情感集》。

不是简，是约翰。《理智与感性》。光是这个标题就是个玩笑，这很符合奥斯汀的风格。

我并不是说整本书都是个笑话。我想，如果真是这样，那它就成了一种言后行为。他用语言讲笑话，而他用语言的目的另有所图。

好的。这本书是对A. J. 艾耶尔的感觉数据理论的批判。不是对语言、真理和逻辑领域的A. J. 艾耶尔的批判。

但我认为，他书中的AJ·艾耶尔，是《经验知识的基础》一书的作者。因为艾耶尔发展出一种现象学观点，即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源于感觉。而奥斯汀在《感觉与感性》一书中指出，这源于他对少数几个词的执着以及对这些词用法的过度简化。

表示感官数据的词语，例如蓝色、方形等等。或者像“看起来”、“似乎”、“好像”这样的表达，都被曲解为：普通的感官知觉存在一种错觉，以至于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看到的究竟是物质还是其他东西。所以我们说它看起来、它好像、它好像。

好的。为了了解这个人的风格，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开头的。我对这种教义的总体看法是，这是一种典型的经院哲学观点，首先源于对几个特定词语的执着，其次源于对几个未经充分研究的事实的执着。

事实上，正如我将要阐明的，我们日常使用的词语远比哲学家们所认识到的要微妙得多，也包含更多细微的差别。而且，感知的事实，正如心理学家所发现的，以及普通人所观察到的，也远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因此，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成为实在论者才能接受我们确实能够感知物质对象的这一理论。

这个问题过于简单，而且完全具有误导性。关键在于，感官数据和物质事物这两个概念相互依存，彼此影响。虚假的并非感官数据本身，而是二者的对立面。

我们感知的并非只有一种事物，而是多种多样。事物的数量，即便能够被简化，也只能通过科学研究而非哲学来实现。因此，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摒弃某些错觉，而这些错觉正是贝克莱、休谟、罗素和艾耶尔等人所提出的，他们最擅长运用基于感官数据相对性的错觉论证。

就这样，他继续捍卫一种本质上属于常识实在论的观点，即我们在感知感官数据时，实际上看到的是物质对象。他在这里抨击的是，嗯，我想我把那句话删掉了。他抨击的是艾耶尔发展出的一种语言现象学观点。

莱尔提出的是语言行为主义。也就是说，心理语言可以被理解为行为语言。艾耶尔则发展出了一种语言现象主义。

也就是说，感官知觉的语言可以被完全解释，最终都归结为感官数据现象的语言。这就是语言现象论。在这两种情况下，论证的关键都在于假定真实物体的语言（心灵、物质）可以翻译成某种其他类型的语言。

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被简化为感觉数据语言。而奥斯汀反对的正是这一点，她认为语言的日常用法截然不同。它们要微妙得多；它们使我们能够谈论两者。

那么，在这种日常语言哲学中，你会看到什么呢？我以吉尔伯特·赖尔和奥斯汀为例，因为斯托特也论述过他们。你会看到，整个实证主义方法被放松，科学主义还原论被瓦解，可验证性理论及其提出方式被否定。这不仅导致了宗教语言的重新引入，也导致了形而上学语言、伦理语言、心灵哲学等等的重新引入。

这就是我们下周要探讨的内容。我还没完全确定讨论顺序，我会再考虑一下。但我们会先探讨自艾耶尔认为他终结了伦理理论以来，伦理理论发生了哪些变化。

当然，语言哲学发生了什么变化，因为这显然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心灵哲学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是我在剩下的时间里想探讨的主题。三分钟。

评论。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够清楚吗？事情的松散化，方法论的改变。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史上经历了一段哲学怀疑时期之后，人们意识到他们必须重新调整思路，并发展出新的方法论。

你看，智者之后是柏拉图的辩证法。希腊化时期怀疑论之后是奥古斯丁所使用的那种辩证法，以及基督教视角的引入。文艺复兴时期的怀疑论催生了培根和笛卡尔的新方法。

休谟的那种怀疑主义催生了康德的先验方法。同样地，实证主义者的怀疑主义（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也催生了日常语言以及此后发生的种种变革。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